

中古时期伊朗与中国的丝路商贸

◎ 雷 钰

内容提要 丝路曾是连结亚非欧三大洲的陆上交通要道,也是推动东西方文明融汇交流的商贸通道。丝路开通后,中古时期伊朗的安息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先后成为丝路上最大的丝绸市场之一。在欧洲与远东商贸交往中,安息人和波斯人相继是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中间商。他们不仅充分利用伊朗高原的地缘优势,而且长期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使安息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在东西方的交往中大放异彩,波斯语则成了丝路上的国际通用语言。中古时期伊朗与中国的丝路商贸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丰富和改善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 丝路 中国 伊朗 安息 波斯

[中图分类号]K373 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1-0138-05

从中国西安出发,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¹的陆上通道,是横贯亚欧的商贸大路。通过这条漫漫长路,最早向西方运送并最具代表性的货物是中国丝绸,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丝路是由多条干道和支线排列组合而成,相当复杂。本文所指的丝路是途径伊朗高原、史籍中记载最多的主干道。伊朗高原扼守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是丝路的必经之地和枢纽。伊朗高原先后被安息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控制,精明能干的安息人和波斯人相继成为欧洲与远东商贸交往中非常活跃的中间人。他们不仅充分利用伊朗高原的地缘优势,而且长期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使安息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在东西方的交往中大放异彩,波斯语则成了“从北京到威尼斯的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语言”。^④

一、安息帝国时期

在中国史籍里,关于伊朗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大宛传》。安息是中国对伊朗历史上的帕提亚帝国阿尔萨息王朝(公元前247-公元226年)的称谓。安息位于伊朗高原东北、里海东南一带,大致相

当于今伊朗的呼罗珊地区,在波斯帝国和塞琉西王国时期是一个行省。公元前3世纪前期,一支属于伊朗语族的帕尔尼游牧部落从今锡尔河流域迁徙到安息。公元前247年,帕尔尼部落首领阿萨息杀死塞琉西王国的帕提亚总督,以尼萨(今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为都城,建立阿萨息王朝,是为安息立国之始。

安息建国后,多次挫败塞琉西王国的征讨,不断扩张领土,屡次迁都。阿萨息之弟和继承者梯里达底(公元前?—公元前211在位)迁都至里海东南的赫卡通皮洛斯。公元前192—公元前189年,塞琉西王国一再受挫于罗马,安息王米特拉达梯一世(公元前171—公元前138在位)坐收渔利,乘机对外扩张。在东方,他首先进攻中亚的巴克特里亚

¹ 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lbert Hermann)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小亚细亚和地中海西岸。

^④ [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页。



王国(大夏),巩固东境;继而西进,占领米底及伊朗西北部各省,并于公元前147年迁都埃克巴塔纳(今哈马丹);公元前141年攻占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米特拉达梯一世是安息帝国的真正缔造者,安息已成为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西以幼发拉底河为界,与罗马对峙;东北与康居和大月氏相接;东南占有坎大哈,远抵印度边境。安息帝国的强大为丝路的全线贯通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汉武帝派遣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公元前126年),经大宛、康居和大月氏,抵达大夏,已接近安息帝国。“张骞追踪大月氏到大夏,虽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的任务,却开通了丝绸之路,创造了文明交往的伟业。”^①

米特拉达梯二世(公元前123—公元前88年在位)统治时期,对内进行军事改革,加强安息骑兵的战斗力,对外继续扩张。向西,越过幼发拉底河,甚至干涉塞琉西王国内政;向东攻占木鹿(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里附近),将帝国东部边界推进到阿姆河一线。公元前90年,迁都泰西封(幼发拉底河东岸),安息帝国达到鼎盛,与东方的中国汉朝和西方罗马帝国并立。为了争夺叙利亚、两河流域和亚美尼亚,夺取通向中国商路的控制权,安息与罗马战事频仍。与此同时,安息却与中国互通有无,友好交往。

公元前119年至公元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率300人使团到乌孙,又从乌孙分派副使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等国访问。公元前115年,汉使抵达安息,两国建立正式友好关系。据《史记》记载,“安息王(米特拉达梯二世)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回国时,安息王还将“大鸟卵(鸵鸟蛋)及黎轩眩人(罗马杂技艺人)献于汉。”^②张骞“凿空”西域后,汉朝设西域都护(公元前59年),政令颁行无阻,丝绸之路全线贯通。此后不久,汉朝政府陆续向葱岭以西的安息、奄蔡、条支、大秦、身毒等国派出使节。有时一年多达十余批,每批人数少则百余人,多者数百人。他们既是使节,也是商队,向外输出丝绸、漆器、铁器、釉陶等商品,其中丝绸的销量最大。

与此同时,安息帝国也一直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公元84年(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安息王遣使来中国献狮子、苜蓿;公元101年(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又遣使节来中国献狮子及条支大鸟(鸵鸟)。^③公元148—171年,安息高僧安清(字世高)在中国传布佛教,在洛阳翻译佛经35部41卷,对

佛教文化的传播以及我国翻译文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在丝路上,安息人“善贾市,争分铢”,^④“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介,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入”,^⑤甚至垄断丝路的中转贸易。《三国志》引《魏略》记载道:罗马“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得过。”^⑥安息人为了操纵丝路的中介贸易,竭力阻止中国与大秦(罗马帝国)建立直接关系。公元97年,东汉西域都护班超经营西域,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当甘英来到安息西界的波斯湾头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口,准备渡海西行时,安息人以路途遥远、风浪险恶为由横加阻挠,甘英遂中途而返。甘英虽未成功达到目的地,但他穿越了安息帝国,走过了大半段丝路,创造了汉代中国使者在丝路上的最远记录。“甘英是史书所载第一个到达波斯湾的中国人,此行意味着欧亚大陆东西两大帝国的第一次外交互动尝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⑦

就安息帝国自身而言,丝路不仅使安息人从国际贸易中获利丰厚,而且也是联系帝国东西部的一条经济纽带,带动了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困扰帝国已久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自东而西,丝路沿线的木鹿、番兜、埃克巴塔纳和泰西封等安息帝国的诸多城市在国际商贸活动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二、波斯萨珊王朝时期

萨珊王朝(224—651)又译萨桑王朝,即中国史籍《魏书》中最早记载的“波斯”。萨珊王朝得名于其创立者阿尔达希尔的祖父萨珊。萨珊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3世纪初,其子帕佩克控制法尔斯省大部分地区,基本摆脱安息帝国的统治。224年,帕

^①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

^②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172—3173页。

^③ 参看《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安息传》,中华书局1995年,第2918页。

^④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95年,第3896页。

^⑤ 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0页。

^⑥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四夷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861页。

^⑦ 彭树智主编:《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2页。



佩克之子阿尔达希尔一世起兵独立,建立萨珊王朝。226年占领泰西封,并在泰西封加冕,自称“诸王之王”,以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建立中央集权的萨珊帝国。萨珊王朝的疆域扩大到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并一度占领塔什干,在丝路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中国运往罗马的丝绸等货物,无论是越葱岭至贵霜帝国,还是越葱岭达大宛、康居,都要汇集于此,然后再西行至罗马。

贵霜帝国衰落后,萨珊王朝势力最强,在丝路上的作用也日益突出,不仅是中国丝绸的主要消费国,而且几乎完全垄断着中国丝绸对东罗马帝国通过陆路的出口,从中取利。无论是东罗马人、突厥人、粟特人、阿比西尼亚人、曷萨人都从未能动摇波斯人的这种地位。东罗马帝国为了打通陆路商道,打破波斯对东罗马丝绸贸易的垄断,发展与东方的直接贸易,先后与萨珊王朝在叙利亚、两河流域、亚美尼亚一带发生过9次战争。东罗马帝国甚至与突厥人联合起来对付波斯人,但都未能成功。针对丝绸贸易战争,萨珊王朝与东罗马帝国签署了种种丝绸贸易条约和协定。君士坦丁堡的丝绸织造业原料,几乎全部依赖波斯进口的中国丝绸。为了维持君士坦丁堡的丝织业和欧洲市场对中国丝绸的大量需求,5世纪后,在波斯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边境上指定了许多丝绸贸易城市和关税机构。如:幼发拉底河畔的卡利尼克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尼西比纳,亚美尼亚阿拉斯河畔的阿塔克萨塔等。在转手中国丝绸的贸易中,波斯人实行高税率,即途经沙漠的各国商队和波斯湾的船队必须向波斯帝国支付高额过境税。533年,查士丁尼大帝付给波斯帝国1.1万磅罗马金币,以谋求开通东方商路。¹

波斯萨珊王朝之所以成为丝绸贸易中最大的丝绸市场之一,一方面取决于其地缘优势,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与中国友好关系。5世纪后,波斯与中国经济文化交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菲鲁兹一世(亦称卑路斯,459—484年在位)及其子卡瓦德一世(488—496年、499—531年在位)统治期间,多次派遣使节访问北魏,与中国关系十分密切,双方交往频繁。仅455—522年,波斯就先后十次遣使,来到北魏的首都平城、洛阳访问并奉献方物。北魏献文帝时曾派韩羊皮出使波斯,韩羊皮回国时,“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孝明帝神龟年间(518—520年),波斯国王派遣使节上书贡物,并

致书孝明帝说:“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④

卡瓦德一世之子库斯鲁一世(库斯佬,531—579年在位)统治期间,帝国达于极盛。572年派兵占领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以断绝拜占廷从海上取得中国丝绸的通路。他十分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曾派出4批使节到中国。马尔科姆《波斯史》记载了中国皇帝为答谢库斯佬、阿奴细尔汪,曾派使团向其赠送天青色绣锦袍一件,上有用金丝线绣出的群臣朝见波斯王图,光彩夺目,盛放在黄金打制的箱子里。另有一幅美人图和一只全身以珍珠络成、两只眼睛镶嵌着红宝石的花豹。

581年,隋朝统一中国,开辟了中西交往的新时代。《隋书·西域传》记载,此时“波斯每遣使贡献”,与中国建立了良好的贸易关系;隋炀帝时,中国派出云骑都尉李昱出使波斯,建立正式的官方贸易关系。波斯王库斯鲁二世也派使节随李昱来访中国,并进“贡方物”。^④从波斯到中国的丝路畅通无阻,包括波斯商人在内的胡商数量倍增。裴矩从胡商那里得到了有关丝路及其贸易活动的材料,完成了《西域图记》其中伊朗高原就是“中道”的必经之地。^{1/4}

在隋朝与波斯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唐王朝以其博大的胸怀与波斯展开了更加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1/2}纷纷传来,异域风格的穿著、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正式传入中国内地。波斯人在具有国际都市风貌的唐朝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路沿途的一些大城市如凉州,设店经商、行医和传教。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华文明也传到了西

¹ 李明伟等主编:《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70页。

^④ 《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中华书局1995年,第2263—2272页。

^④ 以上见《隋书》卷八十三《西域·波斯传》,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857页。

^{1/4} 参看《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中华书局1994年,第1578—1580页。

^{1/2} 在新疆乌恰、吐鲁番、青海西宁和陕西西安等地均发现过萨珊王朝银币。



方。丰富多彩的丝路商贸活动,极大地推动了萨珊文化的繁荣发展。萨珊王朝继承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文化传统,同时吸收融合其它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成就,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萨珊文化,尤其是在工艺美术方面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5世纪以来,波斯人不仅从中国带回了丝绸,而且还把丝绸和蚕桑法传入波斯,发展起当地的丝织业。丝织品上豪华绚丽的萨珊式花纹,对中国、拜占廷和埃及的丝织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波斯人的丝织品统称为“波斯锦”,质量上乘,绚丽多彩,风靡西亚和中亚。隋炀帝曾命人仿制波斯金锦袍。7-8世纪,波斯锦在唐长安城和中国西北地区颇为流行,为中国丝织业增添光彩。

值得称道的是,即使萨珊王朝危在旦夕,也从未中断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仍然遣使贡唐。据《册府元龟》记载,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二月,波斯与康国“并遣使朝贡”;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正月,波斯与康国等国“并贡方物”,同年三月,波斯“献活犴蛇,形如鼠,而色青,能入穴鼠”;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波斯又与康国等国“并遣使朝贡”。^①

萨珊王朝灭亡后,伊嗣俟之子卑路斯(菲鲁兹)逃到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661年,唐朝在锡斯坦的首府疾陵城(今阿富汗西南部的扎兰季)设波斯都督府,拜卑路斯为都督。翌年,卑路斯被高宗封为波斯王。高宗乾封二年(667年)十月,“波斯国献方物”;咸亨二年(671年)五月,波斯又与康国等国,“遣使来朝,贡其方物”。^② 673年,卑路斯亲自访华。由于不断遭到阿拉伯人的进攻,卑路斯不得不于674年入唐避难,定居长安。为了安抚这位流亡的波斯王,同时出于对“西域外交和唐王朝西部疆域的安定考虑”,^③高宗授予卑路斯右武卫将军,并在长安醴泉坊建造一座祆祠。

678年,卑路斯死后,唐立其子泥涅师为波斯王,并派官员护送他返回吐火罗建立政权。泥涅师在吐火罗的20年间,一直与唐朝保持密切关系。高宗永淳元年(682年)五月,波斯与大食等国,“遣使献方物”;中宗神龙二年(706年)七月,波斯又与林邑等国,“遣使贡献”。^④但在阿拉伯人的冲击下,707年,即唐中宗神龙三年,泥涅师返回长安,唐中宗封其为左威卫将军,直到去世。

泥涅师之子蒲桑被立为波斯王后,在河中地区与阿拉伯人一直抗争到730年,但仍不忘与唐修好。中宗景龙二年(708年)三月,波斯“遣使来朝”。^⑤

玄宗开元七年(719年)正月、二月和七月,波斯先后与新罗、靺鞨等国,“遣使朝贡”;开元十年(722年)十月,“波斯国遣使献狮子”;开元十八年(730年)正月,“波斯王子继忽娑来朝,献香药、犀五”,波斯王与新罗王“各遣使,来朝贺正。”^⑥

此后,蒲桑的后代仍以波斯王的名义派遣使者到唐朝贡。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九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朝贡”;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正月,“波斯王子继忽娑来朝”;天宝四载(745年)三月,波斯又与吐火罗等国,“遣使献方物”;天宝五载(746年)七月,“波斯遣呼慈国大城主李波达仆献犀牛及象各一”;天宝六载(747年)四月,“波斯遣使献玛瑙床”;五月,“波斯国王遣使献豹四”;天宝九载(750年)四月,“波斯献大毛绣舞、延长毛绣舞、延舞,无孔真珠”;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八月,波斯进物使李摩日夜等“来朝”。^⑦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六月和九月,波斯又与狮子、新罗等国“遣使朝贡”;大历六年(771年)九月,“波斯国遣使献真珠、琥珀等”。^⑧当然,朝贡者当中也不排除假借波斯使节之名的波斯商人或其他地方首领,其目的是利用中国与波斯之间悠久的友好关系,以便在通商过程中获得更多的优惠条件和安全保障。总之,在萨珊王朝“亡国之后一百多年,唐朝对其中央和地方政府一视同仁,礼遇有加,可谓患难之际,诚信亲善。”^⑨

三、古代伊朗与中国进行丝路商贸的意义

“伊朗文明同中华文明之间的悠久、广泛而互

^① 见《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中华书局1960年,第11399-11401页。

^②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02页。

^③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

^④ 见《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03-11404页。

^⑤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04页。

^⑥ 见《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06-11408页。

^⑦ 见《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09-11414页。

^⑧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15页。

^⑨ 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16页。



动的交往,是一部经久不衰、开发不尽的历史研究资源。”¹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伊朗与中国之间的丝路商贸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丰富和改善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汉代以来,中国的丝织品大量外销,并非完全由内地商人输出,而大部分是由外国和西域胡商贩运经销的。他们将中国丝绸贩运到中亚西亚,进而远销欧洲。正如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所述:赛里斯人(即中国人)“不与别人交往,坐等贸易找上门来成交。”^④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也曾指出,经张骞于汉武帝时出使西域以后,在中国西北,外国使者成批到来,相望于道,络绎不绝。到东汉班超经营西域,丝路更加畅通。丝路沿线各国商人“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④中西陆上交通呈现出一派繁盛景象,“其规模之宏大,要说整个人类的历史与之有关也毫不过分。”^{1/4}

在丝绸西运的过程中,对丝绸的直接需求又刺激了东西贸易之路的发展,使从事居间贸易的安息人和波斯人获取了巨额利润。除了丝绸,中国漆器、瓷器、铁器、药材(如肉桂、生姜、黄连、大黄、土茯苓等),以及许多植物品种,诸如桑树、方竹、梨、桦树、蜀葵、玫瑰、茶树、谷子和高粱等也通过丝路传入西方。此外,中国的缣丝、冶铁、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凿井、灌溉等科技精华也通过中亚、西亚传到欧洲,极大地推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因此,法籍伊朗裔学者阿里·玛扎海里对耿昇先生反复谈到,“西方古代、中世纪,甚至是近代文明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通过丝绸之路而追溯到波斯,进而从波斯追溯到中国”。^{1/2}

与此同时,丝路商贸交往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汉初以来,西来的不仅有苜蓿、葡萄、石榴、黄瓜、胡萝卜、胡豆、胡椒、大蒜、胡麻、茉莉等多种可食植物,还有毛织品、玻璃、宝石等日用物品。到了东汉末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3/4}此当是后来唐都长安“胡化”风气之滥觞。

在商贸交往的同时,思想文化方面的交流也在通过丝路不断向前推进。客观地讲,中国在这方面得到的要多一些。从魏晋到隋唐,西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先后传入中国,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中,波斯的摩尼教,在本土受到镇压,几

乎绝迹,但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维吾尔先民回鹘人中间广为传播,九至十世纪甚至被建都于吐鲁番的西州回鹘王国立为国教。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丝路既是连结亚非欧三大洲的陆上交通枢纽,也是推动东西方文明融汇交流的通道。沟通了人类文明的四大发祥地。公元一、二世纪,沿着欧亚内陆交通干线,古罗马、安息、贵霜和汉朝等四大帝国自西向东并列其间,国势昌盛。罗马帝国在图拉真统治期间(公元98-117年在位)疆域最辽阔,把版图扩大到幼发拉底河上游一带。安息进入“反希腊化”时期,回归伊朗传统文化。贵霜帝国在迦腻色伽在位期间(约公元78-101年或102年),贵霜帝国势力鼎盛,称霸中亚和南亚。汉朝则成功抗击匈奴,控制河西走廊,进驻天山南路。这四大帝国正是通过丝路——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直接联系起来,这既是张骞和甘英等时代英雄的创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丝路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阿拉伯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连接起来,促进了东西方的文明交往,堪称人类文明发展的纽带。“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即新航路的开拓一样,都是世界性的两大文明交往之路,都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阶段性的标志。”^⑥此后的十多个世纪,因政治对立、民族矛盾乃至战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丝路时而中断,但文明的发展,势力的扩张,商业民族的活跃和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民族的依存关系,使得东西方的物质与文化的交往从未断绝,任何文明的发展都不再是相对孤立地进行了。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¹ ③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254页。

^④ [法]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页。

^④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31页。

^{1/4} [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1/2} [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译者的话),耿昇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页。

^{3/4} 《后汉书》卷十三《五行志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72页。

